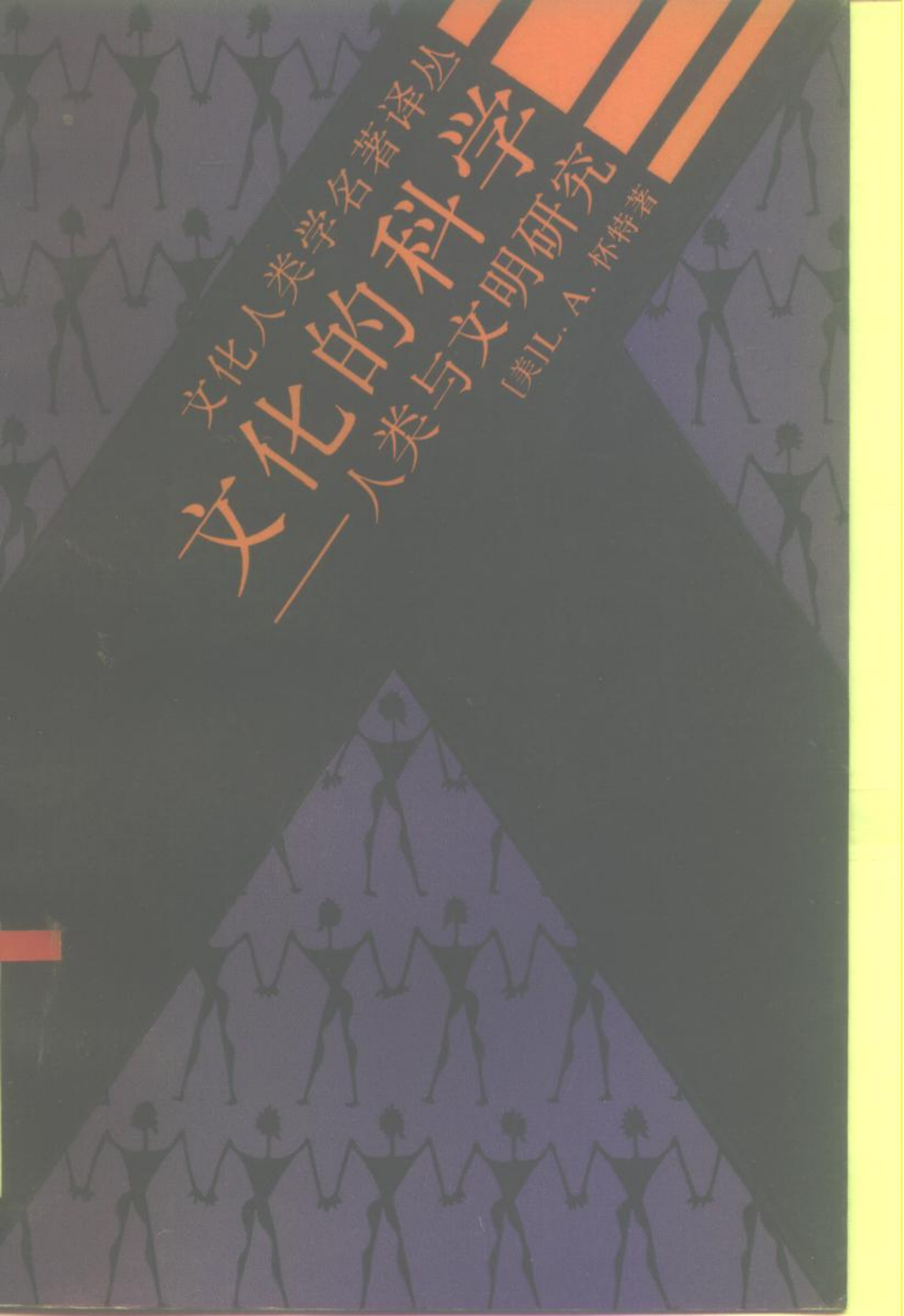


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

文化的科学

人类与文明研究

【美】L. A. 怀特著



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

文化的科学

——人类与文明研究

[美]L. A. 怀特著
沈原 黄克克 黄玲伊译
黄世积校

山东人民出版社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BY LESLIE A. WHITE
FARRAR, STRAUS AND COMPANY

本书根据美国法勒—施特劳斯公司
1949 年版译出

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

文化的科学

——人类与文明的研究

[美]莱斯利·A·怀特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 III 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5 插页 308 千字

1988 年 9 月第 1 版 198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9—00190—5

C·26 定价：5.20 元

出版前言

人类学无疑是研究人的科学。但是，它并不仅仅研究生物的人、自然的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是文化的动物，或者说从猿到人的出现其根本的标志乃是文化的创造。自从有了文化，有了由文化构成的有意义的世界，才把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且随着文化的发展人才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实现。人的意识包括情绪、情感、爱好、兴趣等等的心理以及思想、意志、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都是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赋予的，或者说是文化世界在人的心理机制上建构起来的。因此，要研究人，就不能不研究文化，不能不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这样就出现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分野：前者研究人类的生物特征、体质结构以及不同种族的起源、分布、演变、形成等自然过程；而后者则研究人类不同历史阶段（时间）的文化和不同民族或区域（空间）的文化及其对人的心理的建构、性格的塑造、行为的影响等等文化过程。因此，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可以说凡有文化的人类活动领域，都是它的研究范围。它包括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志学、考古学以及神话学等等。文化人类学与其它学科相互渗透又形成了许多分支学科，如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哲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

文化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又是社会构成的参数，因此，凡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无法严格区分的时候，人们则笼统地称之为社会文化。英国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

60712/15

夫·布朗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以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而存在的,只有把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来研究,才能看出它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因此,他们把文化人类学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英国至今保持着这样的名称。其实,他们所说的社会人类学就是文化人类学。不过社会人类学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中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而文化人类学则偏重于从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作出解释。

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和功能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它不仅建构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而且还构成各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形式成为不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独一无二的社会文化背景。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的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尽管他们的理论观点并不一致,研究方法也各异,但都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研究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某些方面、侧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类不同社会文化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848年以后,特别是到了晚年,把很大精力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并详细地摘录了摩尔根、菲尔、梅因、卢伯克四位文化人类学家的著作,其目的就是为了研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国的文化人类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从研究原始文化转向了研究现代社会生活,因此有价值、有意义的著作愈来愈多,它不仅对人类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给予了真切、确实、详细的描述,而且还对人类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给予了深刻的研究和理论说明,其成果广泛地影响到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研究成果及其著作除了零零散散地被翻译介绍到我国来以外,至今没有

得到系统的翻译和出版。我们现在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整个国家正从一个传统的礼俗的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过渡，因此有选择地、系统地译编一套《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对中国的文化积累，对认识人类不同社会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对探索不同民族社会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以及对建设中国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套“译丛”的编译和出版促进中国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根据“双百”方针，这套“译丛”将系统地选择不同文化人类学家的著名著作。凡是对人类文化研究有一定影响和贡献的著名作家的研究成果，都将考虑选择翻译出版。理论模式可以不同，但层次一定要高，即不选择那些具体地考察各民族文化的描述性的调查报告，而选择那些通过实际调查材料上升到一定理论模式的代表性的著作，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读者的文化及理论视野。另外，将适当地选择一两种文化史及方法论方面的名著，但对一般的概论性的著作则不想问津。这套“译丛”拟在“七五”期间翻译、编辑、并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完毕。整套“译丛”初步定为 30 至 50 种，将根据翻译、编辑、出版、发行情况，调整计划。考虑到国内现有外文图书资料的困难，“译丛”的翻译、编辑、出版将不按由远及近或按理论学说发展的时间顺序进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选择重要著作翻译、编辑、出版，经过几年的努力，最后成为一套系统的文化人类学名家著作译本。因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难免有错误，请专家、读者指正。

《文化人类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1988 年 3 月

译 序

莱斯利·怀特 (Leslie A. White, 1900—1975) 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 曾在密执安大学执教多年。怀特与蔡尔德 (G. Childe)、斯图尔德 (J. H. Steward) 和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 等一起, 被称为文化人类学之“新进化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为坚持和发展文化演进学说的基本原则而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文化的科学》是怀特的重要著作之一, 他的另一部著作是《文化的演进》。在《文化的科学》一书中, 怀特比较详尽地阐释了他的文化观。怀特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所创造的符号的总和, 而语言则是人类这种符号能力之最为重要的形态。在他看来, 文化是一个有其自身生命和自身规律的自成一格的系统, 其功能在于使人类适应自然界, 以保证种的生存和延续。围绕着这一中心思想, 怀特结合人类文化史上的若干实例, 论述了人与文化的关系, 批判了美国人类学博阿斯 (Boas) 学派与族体心理学派的观点; 他还考察了文化演进的历史过程, 提出所谓“文化进化的能量说。”此外, 怀特还从对科学发展史和科学方法论的考察之中, 提出并论证了他关于创立一门文化科学的构想。

为了开展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建设工作, 我们将《文化的科学》一书译出, 以资利用和借鉴。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教研室黄克克, 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黄玲伊两同志, 参加了部分翻译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外经所黄世积校读了全部译稿。由于时间仓

促，兼之译者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沈 原

1988年3月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所

著者按语

早些时候,曾经就读于密执根大学,现任法勒——施特劳斯公司编辑之职的亚瑟·欧蒙特(Arthur Orrmont)先生,建议我将发表在各类刊物上的若干论文编纂为一部著作。由此而导致了本书的问世。收入本书并或多或少地作了修订的曾发表过的论文如下:

1.《科学是把握经验的活动》,(载《科学哲学》杂志,第5卷,第369—389页,1938年);

2.《精神是心性活动的过程》,(载《科学月刊》,第48卷,第169—171页,1939年);

3.《符号:人类行为的为的起源和基础》,(载《科学哲杂志》,第7卷,第451—463页,1940年);

4.《论灵长目动物之使用工具》,(载《比较心理学杂志》,第34卷,第369—374页,1942年);

5.《科学领域的拓展》,(载《华盛顿科学院学刊》,第37卷,第181—210页,1947年);

6.《数学现实的轨迹:人类学的注脚》,(载《科学哲学》杂志,第14卷,第289—303页,1947年);

7.《人类行为的文化学解释与心理学解释》,(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12卷,第686—698页,1947年);

8.《人对文明的控制: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载《科学月刊》,第66卷,第235—247页,1948年);

9.《埃赫那顿:伟人与文化过程》,(载《美国东方社会杂志》,

第 68 卷,第 91—114 页,1948 年);

10.《乱伦的定义和禁制》,(载《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第 50 卷,第 416—435 页,1948 年)。

在《学校与社会》杂志(第 61 卷,第 353—354 页,1945 年)上发表的《教育:美国的魔术》一文,已经并入《人对文明的控制: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一章;《原子能:一种人类学评价》与《能量和文明的发展》这两篇论文中的素材,也已并入《能量与文化的进化》一章。《原子能:一种人类学评价》一文,是我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于费城举行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该文从未在杂志上发表过,^①但却曾全部或大部为某些报纸转载,包括 1945 年 12 月 29 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1946 年 1 月 10 日的《密尔沃基新闻报》和 1946 年 1 月 13 日的《诺福克弗吉尼亚向导报》。《能量和文明的发展》一文是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撰写的广播稿,该节目由美国罗伯公司主办,于 1947 年 2 月 16 日在纽约市播出。后来,该文又被选入由瓦伦·维弗尔(Warren Weaver)编辑的《科学家的讲演》系列丛书之中,于 1947 年在纽约出版。1947 年 5 月版的《技术政治文摘》和 1947 年 5、6 月合刊的《北美技术政治论者》杂志,也选入了这篇稿件。

我为最初发表这些论文的期刊编辑们宽容大度地允许将它

① 好奇的读者将会在 1946 年 3 月 16 日的《科学新闻通讯》、1946 年 4 月 5 日的《科学》杂志和 1946 年 3 月 15 日的《芝加哥核物理学家公报》上,发现国家标准局局长坎顿(E·U·Condon)博士在致科学奖金获得者的一封信件中,对这篇讲演所作的有趣评论。坎顿博士实际上劝告青年和妇女不要受到象我这样的“宿命论者”(即人类事务中的决定论者)的蛊惑。他引证了《圣经》中的言论,并以伊莉莎白·布雷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一段激励人心的诗句作为结语。

还可参考 1946 年 5 月 3 日《科学》杂志上阿兹利·蒙塔古(M·F·Ashley Montagu)致坎顿博士的复信。在这封信中,蒙塔古表述了由他提议、为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支持并经美国人类学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以促使人类学家与其它科学家携手合作,提出“适当的社会约制”来“预防为原子能利用所固有的危险。”对这种“社会约制”的进一步报道尚未出现。

们汇编重印而深表感谢。

在这些论文中，有2篇曾于不久前在ETC.重印过，^①它们是发表在《普通语义学评论》上的《符号：……》（载第1卷，第229—237页，1944年）和《精神是心性活动的过程》两篇论文（载第1卷，第86—88页，1943—1944年）。其中，《符号：……》一文还曾应威廉·克尼柯鲍克（Wm·S·Knicherbocker）博士的要求而加以改写，并刊登在由他编辑的《20世纪的英语》（纽约，1946年）上。

本书重印的若干论文在初次问世之时曾经引起了一些评论。《精神是心性活动的过程》一文招来了杰里德·斯帕克斯·穆尔（Jared Sparkes Moore）教授的严厉指责（载《科学月刊》，第50卷，第365页，1940年），我对此作了简短的答复（同上，第365—366页）。克鲁伯（A·L·Krober）教授撰写了《怀特的文化观》（载《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第50卷，第405—415页，1948年），对《科学领域的拓展》一文表示赞赏并予以详尽评述。迈里斯（J·L·Mgres）教授也在名为《人》的杂志中对该文作了简要评论（第48卷，第11页，1948年1月）。此外，《科学》杂志上还发表了亚丁·波特（Aden A. potter）先生对于这篇论文所作的短评（第106卷，第84页，1947年）。

《人对文明的控制》一文招致了题为《克罗托、拉刻西斯和阿特洛波斯》的答复文章，^②此文出自哈罗德·斯坦缪尔（Harold H. Steinour）之手，刊登在《科学月刊》上（第66卷，第447—448页，1948年）。斯坦缪尔先生争辩说，即便人的意志并不自由，但相信它是自由的，却将是有益无害的；他本人则信奉意志自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埃赫那顿：伟人与文化过程》一

① ETC. 似是西欧译文中心之简称。——译者注

② 该文标题为引用希腊神话中命运三女神之名。——译者注

文惹来著名埃及学家威廉·埃德加顿(Wm·F Edgerton)教授对我的尖刻批评。他指责我不能破读埃及语的碑文拓片,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反驳权威学者的论断”(载《美国东方社会杂志》,1948年12月)。

除上述论文外,我还为本书增添了下列各章:《意识的文化决定因素》、《天才:它的起因和发生率》、《能量和文化的进化》以及《文化的科学》。

虽然《能量和文化的进化》一章以从前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的一篇同名文章的论点作为基础(第45卷,第335—356页,1943年),但却完全是为本书而写就的。《意识的文化决定因素》一章中的有关素材,曾被我用在《个人与文化过程》这篇文章之中,提交给1948年9月14日在华盛顿市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召开的题为“人类个体”的百年纪念座谈会。该文的梗概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第108卷,第585—586页,1948年11月26日)。

由于在这里重印的各篇论文最初都是独立成篇的,因此,当把它们汇集在一起时,就难免存在某些重复和赘言。例如,在一些篇章中都包括了对于作为一个现象序列的文化的界定或特性规定,或者是对于文化的科学以及它将如何活动而作出的说明。在准备付印工作时,我曾试图将重复、赘言之处压缩至最低限度,但或许尚不能尽如人意。我希望读者们能牢牢记住一个事实,即除去少数例外,每一章在原先都是各自独立的文章,因而读者们也要相应地宽容一些。而且,我还乐于补充一句,某种重复时常是必要的,尤其是在论说象文化科学这样较为新颖的理论之时。

原先发表过的这些论文还经过了另一些方面的修订。我在一些地方增补了新的素材,在另一些地方则删除了若干段落。有时,我还将一篇论文中的素材移接到另一篇论文中去。对这

些文章加以修订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些是变动甚多,另一些则大致上原封未动。然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原有文章的前提和论点,以及大部分公式与表述,基本上都维持了原状。

我向许多具有共同旨趣、在长达 10 多年的写作过程中鼓舞和帮助我,并在为眼下这部书提供资料方面付出了劳动的人们谨致谢意。但我所承受的深重恩惠,以及我的感激之情,却远非此等谢意所能涵容和表达。我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那些以各种方式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们的姓名,但我很乐意提及我特别感激的几个人。多年来,我从亨利·埃尔默·巴尼斯(Harry Elmer Barnes)博士温暖的友情中获得了巨大的激励与鼓舞;我的同事沃尔尼·杰尼斯(Volney H. Jones)教授曾在 10 多年里仁慈而耐心地阅读了差不多全部手稿,他那些智慧和善意的忠告使我受益非浅;密执根大学数学系的韦尔德(R·L·Wilder)教授欣然审阅了《数学现实的轨迹》一章手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我相信我还得益于以往 15 年中聆听我的课程的学生们。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之中得以所谓“精炼”本书中陈述的那些思想。学生们人数众多,无法在这里逐一提及他们每个人的姓名,但我仍希望能对他们那饶有趣味和富于建设性的批判,以及他们的耐心与宽容这两个方面,表达我的深情厚意。

在规划本书的体例方面,约翰·法勒(John Farrar)先生和他的儿子克堤斯·法勒(Curtis Farrar)都曾提出过有价值的建议。

我妻子在我整理手稿期间曾给予我巨大的帮助,更不用提在构想和写作这些论文的年代里她所给予我的鼓励和忠实的支持了。我难以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对她的一片感激之情。

莱斯利 A·怀特

密执根大学

密执根州 安那伯市

序 言

文化一经出现，就处于分化之中。自人类历史的远古时代开始，各地域的人群就由于语言、习俗、信仰及服饰——就其有所用以蔽体而言——等方面的差别而彼此区分开来。我们可以相信，人也始终能觉察到这些将他自己的群体同其它群体划分开来的区别。所以，我们或许能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总是具有文化意识的。而且，至少从希罗多德(Herodotus)^①时代以来，人们便尝试着说明人类文化的变异。某些思想家根据环境影响来解释文化差别：一种栖息环境会产生一种文化类型，另一种栖息环境则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另外一些思想家却倾向于将文化变异归咎于人类先天心性或气质方面的不同。在较近的年代里，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新兴科学，拟出了社会行为科学的一般原理。但是，这些原理被设想为在全人类中皆通行有效，因而不能说明诸部族和诸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社会互动是一种普遍的过程，冲突、协作、调适和四种愿望^②也是人所共具的。它们能够说明文化的一致性，却解释不了文化的差别。实际上，这两门科学并不曾致力于文化变异问题，它们几乎是完全局限于一种文化架构即西方文明之中的。当人们转而探求诸

① 希罗多德(前484年—前425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9卷，其中记载了大量希腊及异邦习俗。——译者注

② “四种愿望”似指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托玛斯(William Isaac Thomas 1863—1947年)提出的人类愿望的分类理论，包括：(1)求赞扬的愿望；(2)求新经验的愿望；(3)求反应的愿望；(4)求安全的愿望。——译者注

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时，就会发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

在人类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之前，除去单纯着眼于栖息环境与文化之关系的环境决定论以外，各类说明都把人和文化想象为水乳交融的事物，都不曾把文化从其人类载体中分离出来而加以思考。然而，随着科学的进展，产生了把文化当作一类独特的事件，当作现象的一个独特序列的认识。人们看到了文化不只是为了对于栖息环境的反应，也不是“人类天性”之简单和直接的显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它穿越历史，从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最后，人们终于理解到，决定文化的因素就存在于文化流程自身之中；语言、习俗、信仰、工具和礼仪，都是前导或伴生的文化要素和文化过程的产物。总之，人们发现，从科学分析和科学解释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就应当把文化当作自成一格的事物，当作基于其自身的公理和法则而运转，因而归根结底也只能根据其自身的要素和发展来说明的一类事物和进程。这样，文化就被看作作为一个无求于外的自我决定的进程，一个唯独从其自身中才能予以阐明的进程。

完成科学中的这一重要发现和进步，乃是人类学的使命，恰如克鲁伯所说，正是人类学家“发现了文化”。与其姐妹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形成对照的是，人类学这门新兴科学沉浸于文化差异之中，关注此类事物实际上构成它的主要课题。它能够指出，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显著的文化变异是与稳定的人类体质类型共存的，例如，在体质形态十分稳定的南美印第安部族中，仍然出现过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化。可见，生物学常量不能解释文化变量。人类学家还能看到，虽然一定的环境形态为文化的形式与内容提供条件，但并不决定它们。例如，北极圈的气候

绝不必然地意味着搭建暖帐和缝制皮服。事实上，正如区域比较调查或某个单一地区之长期考古学记录所表明的那样，文化的巨大变迁可与任何给定的环境形态相容。于是，人类学家就能够使自己摆脱陈旧的理论基础，即以文化为栖息环境或“人类天性”所决定的理论基础，从而发现了文化的文化学规定性。

伟大的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似乎头一次明确地把握住这一新的观点，他在《原始文化》这部巨著的第一章中，以一种简洁的风格陈述了文化学的观点，勾勒出文化科学的轮廓。继泰勒之后，杜尔克姆（Durkheim）、克鲁伯、罗维（R·Lowie）、威斯勒（C·Wissler）和其他许多人发展了这门新兴科学。然而，进展并不平稳，也未曾持续下去。后来，出现了对文化学观点和目标的离弃。最近几年，许多美国人类学家不是从文化自身中解释文化，而是转向人类有机体的显性反应，转向承担这类反应的深层潜意识力量。例如，许多受过良好训练，饱受传统熏陶、极宜从事文化研究的男、女人类学家已经放弃了文化，而在他们从未或绝少接受过训练，除了诉诸简单直观外别无他法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领域中漫游。他们为了精神病学这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文化学的长子权^①。

但如果不是人类学家，尤其是文化学家，还有谁去研究文化呢？近来我们目睹了美国人类学的显著退步，但这并非最终结局。泰勒所开创的科学进展迟早会重新起步。正如克鲁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科学中的时尚与风气变幻无常，但科学进步的强大主流，却深藏于表面的潮流与漩涡之下。克鲁伯说道：“人格是一时的口号，……诸如‘墨迹试验’之类的方法是一些表面上迷人的小把戏……[而]我们这个国家喜欢小把戏

^① 为套用《圣经·创世纪》第25章一段故事而来，意指得不偿失的交换。——译者注

……，用不了一二十年，作为一种时髦刺激的罗夏之流（Rorschachs）就将相应地为那时的继替者所取代^①。”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文化科学的若干方面：文化的起源和本性；对文化的科学说明的产生，以及这一新进展的历史纲要；心理学与文化学的基本区别；以及最后，关于文化学解释之观点与方法的若干论证。

^① 罗夏（Hermann Rorschach，1884年—1922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创立墨迹试验法，为测定人格之工具。——译者注